

卅載親炙懷右老

樂恕人

後生小子呈詩一首

五年前（民國五十三）秋冬之交，我自東京重返高原養荷兼理公務和寫作後；那一日，信手翻閱到臺北徵信新聞報。突然，展開在我眼前的十一月十一日的第三版全版新聞，竟是我初則驚，繼則泣的不平常報道：

國族大老于右老仙逝了！

我讀到這項惡耗，正是夕陽無限好，將近黃昏時候。窗外草木蕭瑟，山頂積雪成堆，我正料理完公事，躺在病床上休息，等待着晚飯送來。

右老雖然久病，但國人還祈望着他老人家吉人天相，早占勿藥，誰料得到，他在九十天鬪病之後，依然藥石無效，辭別了人間！

我當時一面捧讀右老仙逝的報道，一面看着他老人家銀髯飄垂着的遺影時，禁不住心中幾陣酸痛，無限悲傷，熱淚竟至激激奪眶而出，流在我的面上，再落到枕上。

高原日落，寒氣逼人。我們五時進晚飯，我在那年冬天初次利用了一位好朋友贈送的日本新

式電氣紫外線暖桌。冬天的病舍二樓，十室八空，僅我同遠處另一日本病人。戶外風聲乍起，愈增我淒清之感。我一面食而不知其味，一面却回憶起近三十年來的于右老，從我在民國二十五年夏天初次拜謁老人家於南京，到民國五十三年九月我寄呈用毛筆恭錄拙詩惡詞的日本式清雅箋爲止，愈發增加我的悼念。乃正襟危坐，提筆哭吟了以下一首七律，以誌我無比的哀痛。

忽傳天外巨星沉，木壞山頽淚滿襟。
隴樹秦雲懷偉績，鍾山蜀水憶徽音。
詩成鼓角驚天地，筆走龍蛇邁古今。
卅載恩情叨訓誨，神州待復慰高吟。

我相信，右老仙逝後，他一生的事蹟，將在國史上留下最光輝最燦爛最有份量和有價值的篇章；同時，他的故舊同仁，或是後生晚輩，爲文以紀誌其生平的，當如汗牛充棟，備極哀榮。蔣總統曾特派大員治喪，以「崇報元勳，表彰耆德」。可惜當時我在困厄中，未能飛返國門，忝居拜奠之列。

但豈能無文以紀念我同此一代大老的緣分？因此，我謹回憶近三十年中，寫出值得紀述的幾件私人間的往事；而這些往事也是與時代和國運分割不開的，當不致有謾右老在天之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夏天，我以初入二十的青年，從家鄉沿成渝公路到達重慶，再搭乘民生公司民權輪沿江順流直放南京。沿途初則橫貫西東兩川的丘陵地帶，繼則沿江東下，渡着大詩人李白和蘇軾出川時的同樣航程。江山如畫，國難方殷。到達南京後，目的是投考秋季招生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

我立志做記者深受先大兄樂愛人的影響，他在民國十幾年，二十幾年時代，先後在北京和成都辦過報紙，同報界聞人陳銘德、周欽岳等有過金蘭之交，不幸他辦的報紙，先後受北洋軍閥及川中軍閥的摧殘，報紙被封，僅以身免。我那年出川，成都報界領袖二三人，如兩大日報的新新聞總經理陳斯孝，和華西日報社長舒君實等，都敬具「名正肅」的候片，託我到南京時，往謁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以表達川中後輩對他的崇

敬。

我當年以一青年學子，要去拜謁黨國元老，却曾緊張了好幾天幾夜。終於在監察院中，我拜見了于院長。屈指一算，三十幾年前，他還未到花甲之壽，身着布料輕衫，青鞋白襪，蒼髯如戟。他貴為院長，但却慈祥平易，使我後生小子神態稍安。我囁嚅叩安，再呈上他們拜候的名刺。而且，我雖僅讀過有限的詩書，也知道李白曾以「上韓荆州書」干謁過身為荆州刺史的韓朝宗；白樂天到了長安，也以「賦得古原草送別」呈過當時的大名士顧況等等史實。我在晉謁于院長的時候，不揣冒昧地把我平生第一首舊詩題名「謁孫陵」的七言絕句，早就恭錄好了，即時呈上。我並未想干謁甚麼，僅為表示後生小子憂國之殷切，想投考政校，攻讀新聞學，以便獻身新聞工作。

于院長當時一見我的「謁孫陵」七言絕句寫道：

「紫金山上暮雲橫，一片松濤帶恨聲。嘆息
藩籬皆盡撤，我來萬里哭先生！」

我記得右老當時頗露喜色，但他却又很鄭重地對我說道：

「好好，有熱情，有感慨……你好好唸書，做記者要特別研究文學和歷史。年紀大了以後，多讀詩，自然會做詩，好好用功吧。」

他又問了一些川中的近事，和成渝兩地新聞事業的近況，我都一一奉告，然後才告辭而出。歸後告知二三友好，認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殊榮。

投考政校，先要經過體格檢查，我不幸因兩眼在燈下用功熬夜趕考，因而發紅，檢查官竟說我有重砂眼，不得及格，連參加筆試的機會都沒有。

政校因為是公費，出路又有保障，所以在民國二十四五年是最難考的時期。我不敢說如果參加筆試一定會考上，但末嘗沒有希望。結果辜負了滿腹「經綸」，一腔熱血；一氣之下，捫攢行囊，北上古城，準備負笈故都，並與在平賣文為活的先大兄在一起過活。於是，在南京過了壯烈盛大而令我一生難忘的雙十節，深秋時候，乘平浦通車到了北平。後來知道，政校那年新聞系只收了八名學生，其中有今日任我駐澳洲大使館大使，前任行政院新聞局長沈鈞；現任臺北大華晚報社長耿修業；臺北聯合報社駐美特派員毛樹清；現在馬德里隨夫婿駐西大使朱撫松的女作家徐鍾珮；現在東京的亞細亞生產性機構公共關係室主任潘煥昆；現任臺北聯合報資料室主任的黃宣威，和另外兩位現況不明的學友。

到了北平以後，早已過了各大學招生期，於是感慨叢生，一以大局因日軍在華北侵略日積，汲汲可危，一以首都故都聞見甚豐，竟至洋洋灑灑寫了兩篇巡禮記，約三萬多字，投之成都華西日報。該報那時已由王伯與任社長，我並不認識他，而他却連續發表我的拙文在要聞版後，寄來紅封套聘書一張，請我擔任該報駐北平記者，月薪大洋三十五元。

我當年的興奮，無法形容，是我因禍得福，政校新聞系雖未考上，但却提前四年，開始我的

記者生涯了。

及後在平工作不到一年，就發生了「七七」蘆溝橋事變，我在北平陷敵前還拍了幾則電報和寫過四篇通訊給華西日報，後來日軍進城，我躲藏起來，一度且與八路軍游擊隊代表密晤於中南海，最後決定南下參加抗戰陣營。迨到逃出古城，已經是南京失陷之後了。

從北平經上海、香港、廣州、長沙而到漢口，沿途又作旅行報道；在漢口勾留數月，最後「保衛大武漢」失敗，我隨軍退到湘西，又經荆沙而溯江回川，觀光抗戰陪都重慶，再回到老家成都平原。

翻山越嶺恭請福證

民廿八年秋，我考進政校和中宣部合辦的「新聞事業專修班」在重慶南溫泉受訓一年，又再第二次拜謁到右老。

有一天，右老以特別講師來班上講「新聞評論」，仍舊布衣布履，曳杖而行。我已經略有記者經驗，並擁有當時後方很少有的德國康太斯（Conrad）舊像機一架，乃於右老講授完畢乘車返山城前，特趨前請安訪問，並為他攝影留念。他於聞悉我幾年來的經過後，笑着對我說：

「好極了，你已經有志竟成，今後受訓完畢，抗戰中的新聞事業大有可為，好好的努力吧。」

民國廿九年秋，我們受訓完畢，正巧廿五年我考失敗而他們考上政校新聞系成功的朋友們，却又在同時卒業，後來還有好幾位同學成為同事

，成爲知友。

我和沈鎔、徐鍾珮、陸鏗、周西伯幾位同學依照政校校規，派往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實習三個月。當年該處處長是現任中央通訊社管理委員會主委曾虛白先生，而由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先生兼負督導之責，下面幾位科長，任編譯科長的是現任外交部常務次長沈劍虹；現任駐巴西大使館公使的崔萬秋；任主任秘書的是現任中央社副社長王家楫幾位尊兄。

沈鎔和徐鍾珮兩位，因爲英文程度較好，就留在該處任外國記者新聞電報的檢查員；而我和陸周兩位則以英文較差，派到該處所監督指導的「國際廣播電臺」擔任中文編輯。

後來，周西伯他去，我和陸鏗繼續在電臺編寫中文廣播新聞稿，亦述亦評，文體要讓國語廣播小姐聽得順口才是。

二三月後，我和陸鏗俱以個性是外向型，每日伏案，頗爲不耐，極欲在抗戰陪都活動活動，採訪報道。我們私下商議，中國向無廣播電臺的記者在外採訪，乃向我們的傳音科長彭樂善建議，願以記者名義外出採訪。彭是美國作風，立即欣賞而轉呈董顯光、曾虛白兩先生，很迅速即被批准。

我和陸鏗立即以無限興奮的心情，印就名片如下：「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新聞記者」

是年冬季，我們二人四出活躍，採訪到的新聞，立即趕回電臺，或以電話通知電臺，如此把電臺等候中央社發稿來再改寫廣播的許多新聞，提早了好幾個鐘頭。我們的中文稿當即被譯成英

、日、俄、法等文字，向全世界播送了。

可是，當我們初出採訪時，竟遭到重慶各報記者的側目而視，認爲什麼電臺也有記者？好像不屑與我們爲伍。可是，我和陸鏗不但能跑，而且也能寫，且活動很強，後來他們竟奈何不得。想起來，今天中國的廣播記者身背錄音器，手持麥克風，無處不有他們的採訪活動；而這兩位在三十年前打天下的前鋒，陸鏗身淪大陸，本人養荷異國山野，多少不無今昔之感。

這一年當中，我們同右老接近的機會很多，有時又請他老人家去電臺廣播，他對我們也極爲青眼相加，教誨殷切，令人難忘。

右老那時因空襲在距離重慶市區二十幾華里的山洞有一座別邸，不時前往小住。

適逢陸鏗兄同楊惜珍女士在渝結婚，禮堂就在當年重慶最高尚的社交中心——嘉陵賓館。證婚人不成爲問題是于右老。因爲右老經常爲許多有名士女證婚，何況他所最欣賞的後輩陸鏗兄的婚禮呢？然而，右老毫無下山的消息。我們急得非同小可，大家決議請我在婚禮前天，上山一行，當面拜請右老下山證婚。我爲好友大事，身爲婚禮總招待，當然義不容辭，起了個早，搭公共汽車，上山洞去。

我是第一次到右老的山洞別邸，一時迷途，尋覓不到，在山徑上奔走，汗溼衫袖。好在那時正是二十六七歲的青年，終於翻山徑，越森林，到了別邸。我向老人家請安後，嗣即表明來意，懇請他下山一行，那怕僅到一小時，再返山洞不遲。右老沉思片刻，莊重得毫無笑容地對我說

道：

「你且下山，等我好好考慮考慮，再作道理。」我自然不敢立即要他決定，僅再作懇求後，方才返渝「交差」。

誰知第二天盛大婚禮開始前，右老竟沒有下山，僅派了一位代表前來用印。當時，大家失望的情緒可以想見；同時，也就知道那幾天老人家的家境，大有問題，無不心照不宣了。

不久，我們辭離了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和學友朱培璜、葉德靖賢伉儷合創「僑聲報」，最初僅出版三日刊，而且還在他人處代印。

老人家好高興啊

一九四一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再襲南洋，引起美英等國對日宣戰，這是抗日戰爭期中天字第一號的大新聞。這樣重大的特號新聞，竟爲小小的僑聲報三日刊首先獨得，出了號外；把各大日報如中央、大公、掃蕩、時事新報、新民報等等十幾家，甚至中央社，遠拋在一小時之後，簡直令人不能置信。

我很徵倖最初採訪到這項天大新聞的記者，也是我一生最得意的新聞採訪。號外出版之後，我就去拜謁右老，向他報告這一驚震全球的大事，並請問他對抗戰建國的前途，當作如何的看法？老人家的回答是：抗戰更會加速得到勝利，我們的犧牲更會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那時的快慰言談，我至今記憶猶新。

試想想，中國那時已經單獨對日作戰四年多了，早已打得筋疲力竭；突然，美英等國參加對

日作戰，我們成了同盟國，那種狂歡興奮之情，豈是身在淪陷區或海外的中國人所想像得到的？不久，敵軍入侵緬甸，企圖截斷我們的國際交通要道，佔領緬甸的首都仰光海港。

英緬軍力薄弱，經過中英美三國軍事將領在重慶會商後，中國遠征軍入緬協助盟國抗敵，成為百年來戰史上的大事。

在重慶，有兩家外國通訊社的重慶分社主持人是中國籍記者：英國路透社是趙敏恆，美國合衆社是王公達。趙王都精明能幹，趙更老練，消息極其靈通。他當時看見我獲得報道珍珠港事件的驚人成功，心裏也許在想：這小夥子居然搶在我的前面去了。好罷，他要請我工作了。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僑聲報，開門見山，說是請我代表路透社到緬甸去隨軍採訪。

在僑聲報社務會議上，大家一致主張我挺身前往，我就接受了趙的聘請，欣然飛緬，隨中國遠征軍採訪。不幸那年遠征慘敗，我在緬甸全境失守，遠征軍主力潰敗後，只保存得一本護照，狼狽退到昆明，再轉回重慶。那時，敵軍乘勝突入滇西，直抵怒江西岸，昆明告急，重慶震動。我這時又去拜謁了右老，老人家滿面憂色，同我在入緬前去辭行時他喜形於色相較，完全兩樣。才不過二月功夫，而戰局逆轉如是之烈。可是我向老人家報告，敵軍絕對不會越怒江而東，我曾見千軍萬馬，趕調往怒江東岸佈防，相信戰局一定轉危爲安。右老似乎鬆了一口氣，但還是不勝其憂戚。

事不兩年，我們駐印軍反攻緬甸大勝，與滇

西遠征軍收復失地，即將會師中緬邊界前夕，我在隨軍反攻十個月後，凱旋回到重慶，與高采烈地又去拜謁右老。

那一次可把老人家高興得了不得，不幾天就在上清寺監察院中擺盛筵一桌，爲我接風洗塵。秘書長程滄波先生，和其他監委老先生等近十人，應邀作陪，陸鏗兄也坐在右老之旁，代爲招待。而我，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記者，却高據首席，爲諸老漫談緬北叢林戰事，不覺豪情迸發，多喝了右老所賜的幾杯佳釀，一時滔滔不絕；大家也爲了戰局一新，勝利在望，樂得聽我高談闊論。

幾天後，右老在新聞界某處公開講演，他說可惜他年紀大了，不能再做記者。他看見有些青年朋友，甚至遠涉異國，在荒山叢林中，在槍林彈雨下，爲國家採訪報道，真不禁爲之神往。

我知道老人家在宴請了我以後，他很高興見到後輩們那樣活躍，爲抗戰建國而勇往直前；所以，特別講出來，鼓勵更多的年青人爲國家，爲工作而努力奮鬥。我那時在暗中的安慰和快樂，也是無以復加的。

又過半年，德國投降，日本已成強弩之末，敗降在即。我却代表重慶世界日報和昆明中央日報前往英倫採訪歐戰勝利後的大選，並轉趕歐陸，縱橫採訪報道。

萬里遠行前，我又去向右老拜辭，右老留我在監察院便餐，並以三杯美酒，同衆友好祝我長風萬里，佳音頻傳。

而我在拜別右老時，却向他說道：「老人家

爲國珍重，下次回國給您請安，是在南京，而絕不會再是重慶。」

右老領首掀髯呵呵大笑，我深深鞠躬而別。

白頭相映亦風流

回想在重慶五六年當中，我們有幾位朋友於公於私，都常到監察院或右老山洞別邸去拜候他。他的長公子望德尊兄，我們反不常晤面，因爲一以他年紀較我們爲長，再則他常服役在外。但我們却和右老的二女公子想想不時在一起談談天。想想的年紀比我和陸鏗兄稍小，可是她的性格爽朗，健談，所以我們很談得來。三女公子綿綿，那時年紀不過十來歲，不大出來和客人談天；還有一位最小的女公子，我甚至忘記了她的名字，我想她那時恐怕不到十歲。

抗戰後期，想想去成都肄業於復校後的燕京大學。我在抗戰勝利前不到一年，曾回家鄉去省親拜辭，準備遠赴英倫工作。我曾經去約得想想吃了一小館，談了些年青人在抗戰中的各種問題。因爲那時想想和我一樣，都遭遇了愛情上的創傷，大家談起來彼此非常同情。

我後來把話題轉到成都，說是他們三代人全和我家鄉有了淵源。想想的先尊祖新三公，就常在成都經商，而右老則在戰前戰時，幾度來往成都。我還記得右老有一首遊工部草堂的七絕詩道：

「丹桂飄香迷古道，櫻楠接葉入雲霄。老來詩聖門前過，幾度沉吟萬里橋。」

那時，想想又到成都讀書，豈非于府三代人

全和成都都有關係了麼？

且說當年從重慶時代起，右老把我們當成子侄輩看待，連陸鏗兄的號「大聲」，也是右老送給他的。因為那時陸鏗兄在中央廣播電臺任總幹事，右老說他在廣播時聲音宏亮，對「抗戰建國」作「大聲疾呼」，因而叫他「大聲」的。

我們幾位後輩，因為常去拜候右老，不但他府上的家人很熟習，就是他的侍從秘書李祥麟，侍從副官宋子才、張玉璞等，我們也很熟習。而我們對右老的敬稱，既非「院長」，也非「右老」，而是很親近的「老人家」，我們幾位全是西南川滇二省的人，這「老人家」一詞，在西南是對最尊敬最親切的老前輩的稱呼呢。

勝利前夕，我和陸鏗兄幾個人，幾乎同時被派出國工作。在歐洲一年，初去時，正值德國初降，日本未降之際。法國尚未再起，中華民國是四大強國之一，我們中國記者那時雲集歐洲，計有：

七八年前即代表大公報駐英的蕭乾；德國投降前不久即去歐陸的中央社余捷元；以及德國投降後趕到的中央日報毛樹清、徐鍾珮；中央社徐兆鏞；中央廣播電臺陸鏗；掃蕩報陸晶清；新民報丁垂遠；和代表重慶世界日報及昆明中央日報的我。

那時，駐英大使是顧維鈞少川先生，葉公超先生則以參事銜主持中央宣傳部駐倫敦辦事處，現任駐西班牙大使的朱撫松兄，也就是徐鍾珮的「御主人」，（日本尊稱婦女的丈夫之意），則在葉先生部下任編譯。總編譯是一位英國老漢學

家，第一次見我時隨口用中文以孔子之言迎我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使我頗為驚愕。他的座右銘是用毛筆寫的中文曰：「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孫子兵法名言。可惜我至今竟忘了他的大名，此老當已作古了。

葉先生健談好客，他的辦公室就成了我們中國駐英記者之家，在他的春風滿座中，我們工作生活，兩蒙其利，一生難忘。

後來我們縱橫歐陸十餘國，風光景象，千載一時。

不久後，日本繼德國之後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結束，國內為接收還都忙，更為共黨叛亂而戰爭延續。我和毛陸等僅寄呈右老三五次蕪箋，稟告行止，叩問安好而已。

一九四六年我和毛樹清兄同行赴美，採訪安全理事會在紐約開會的重要新聞。稍後樹清兄轉任上海申報特派員，我却接任紐約中國五大日報之一，而有悠久歷史的民氣日報的主編編務。

一九四七年秋，我應南京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先生的聘請，回國接任該報的採訪主任職，原任陸鏗兄則已昇任副總編輯。那時期，總編輯是現任臺北大華晚報董事長的李荊蓀兄，另一副總編輯是現任臺北中央日報副社長的錢震（伯起）學長兄，編輯主任是現在臺北寫「老沙顧影」現任臺灣電視公司節目副主任的鄭炳森兄，資料室主任則是現任大華晚報社長的耿修業兄。

從那年秋到第二年冬，只工作年餘，即遇上共黨猖獗，政府遷往廣州。

我在一年多時光中，經常到右老的官邸去，

有時為新聞採訪，有時則是去給他老人家請安，談天。

在南京時期，有兩件事回憶如在昨日。

當民國三十七年秋，徐蚌會戰前夕，時局日趨緊張，政府形勢更加不利。有一晚，我和陸鏗兄去到右老官邸，右老的憂戚之容，有勝於第一次緬甸遠征失敗後，我回重慶見着他的神情。那晚在官邸便餐，同座有監察院秘書長李崇實先生，監委劉延濤兄等。

那晚在右老官邸，一頓晚飯是在愁城中食用的，只是飯後右老叫人以剛由新疆友人送到的一對哈密瓜剖來共嚐，大家開顏談水果，我和陸鏗，也得生平初次嚐到哈密瓜的滋味。

再有一次，即是南京紛紛撤退，中央日報決定遷避臺北。我在疏散之前，帶着我準備結婚的女友，畢業於燕京大學教育系的北平小姐李××，前去右老處辭行。並且我向老人家稟告，前去廣州，恭候他蒞臨證婚。在南京，我因循延誤了佳期，而早就拜請右老證婚的宿願，則只好待之白雲山下了。

那晚，右老有無限沉痛之意，他自動地對我們說道：「到書房來，我要給你們寫幾個字，留作紀念。」

那晚沒有別的客人，夜深人靜中，右老為我題了一幅橫軸，是他很少有寫的核桃大的草書，題的是：「夜靜雲開月已斜，城樓倚杖聽殘笳。關河離亂無歸路，兒女團圓有幾家？獨酒因風酬故鬼，戰場如雪放薔花。可憐垂老逢佳節，淚灑戎衣惜鬢華。」

詩後略跋數語曰：「中秋夜登民治園城樓之作時在民國十年」並爲我題款曰：「恕人老弟法家正是，三十七年十二月于右任」

右老當時的傷時憂國之情，從他題這首舊作時就可以想像得到。

給我的寫完以後，又給我的女友另題一幅條幅，也是用核桃大草書字體寫的，那是：「我與天山共白頭，白頭相映亦風流，羨他雪水漚田疇。風雨憂愁成往事，山川顛倒幾經秋，暮雲收盡見芳洲。」

我所認識的羅恕人將軍

不服小林德的氣

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廿五日下午三時，我從外面回到臺北友人寓所，主人告以羅恕人將軍來電話約我赴國際飯店品茗。時有大颶風進襲臺省的氣象。人心惶惶，我不敢出門，亦未跟恕人再聯繫，次日大風驟起，淫雨交作，臺北市水電皆停。迨廿七日報載恕人逝世消息，我爲之震驚不已，急馳往羅宅探視究竟。據其家人言：廿五日下午三時恕人以未獲約我外出消閒，閉門晝寢，迄五時半猶未起，家人啓門視之，即見其倒臥地下，

款題是「浣溪沙哈密西行機中作××女史正之，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于右任」

題寫完畢，右老叫副官取過一冊「右任詩存」來，送給我，並題款在上面道：「恕人弟惠存，右任三十七年十二月」。

這冊「右任詩存」是右老的弟子，聞人如張治中，吳開先等二十五人，用硃墨印刷二百部，以紀念右老於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戊子春日度七十榮慶的。我不但有這福份獲得一冊，而且由右老親自題款送給我，至今視如至寶，不時捧讀吟誦

，口吐腹中食物，痰集喉間呼呼有聲，急送臺大醫院救治，迄深夜乃告不起矣！我與恕人相交逾四十年，誼同昆季，彼於臨死之前尚望跟我一晤而未能，應有遺恨；余則落拓天涯，痛感故交凋零，涼涼踽踽。人生至此，其何以堪！

我於民國十八年識恕人於南京，時君擔任國軍許克祥師部駐京辦事處主任，我於役內政部，彼此寓所距離近，過從密切，每逢週末，常聯袂赴滬上，必下榻跑馬廳「一品香大旅社」。上海法租界有一輪盤賭檔，規模宏敞，君常往參觀，亦試投小注，久之，君憑其數理智慧，體會盤中

。如今右老仙逝已五周年，行文至此，我展卷省視，中心着實有無限哀思！

當晚我同女友叩別右老之時，我爲老人家開開心道：

「老人家萬請珍重，在廣州恭候證婚，這次一定要拜請老人家親自蒞臨了。」

右老點點頭，他和我都曾作會心微笑。因爲在重慶時期陸鏗兄的婚禮，他因特殊原因，不曾親臨，只派侍從秘書李祥麟去代表用印而已。

（未完）

雷嘯岑